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郭沫若文学研究 管 窥

黄侯兴 编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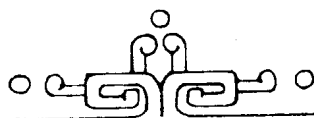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郭沫若文学研究 管 窥

黄侯兴 编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郭沫若文学研究管窥

黄侯兴 编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350×1168毫米32开 10印张 5插页 221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7-5309-0120-6/I·20

定价：2.85元

出版说明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大型系列化丛书——《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是以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要任务的。它是大学生、研究生跨入学术殿堂的基础读物，也是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必备参考书。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空前活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结出了累累硕果。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大批青年人为这种日益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所感染，希望跨入学术殿堂，为科学研究献身。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专著、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遍翻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常常接触自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但需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

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概览性的、既有成果总结又指示学术研究门径的书。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地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

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摘要和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处觅”的烦恼。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将为保存和积累文化，繁荣学术，培养新一代学术接班人起推动作用；从出版角度看，它填补了学术著作领域特别是“入门”这个层次的空白，也算作我们对出版事业的一点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帮助，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目 录

一	六十年研究钩沉	(1)
二	《女神》的基本评价	(50)
三	诗人艺术个性探索	(75)
四	泛神哲学思想的讨论	(94)
五	前期文艺思想研究的分歧	(113)
六	世界观转变的界标	(135)
七	小说散文研究领域	(147)
八	历史剧研究之争鸣 (上)	(169)
九	历史剧研究之争鸣 (下)	(201)
十	《李白与杜甫》辨析	(230)
跋		(248)

附录

郭沫若文学研究资料索引选辑	(253)
---------------------	-------

一 六十年研究钩沉

当我们环顾六十余年郭沫若研究的历史的时候，对于郭沫若这样一位富有独创性的诗人、戏剧家——他和鲁迅一样，从“五四”开始就站在时代的前列，是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有重大贡献并且可以代表发展方向的作家；他以他的新诗集《女神》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创造社，形成了现代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倾向与文学流派；他后来又是在历史学、古文字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做出贡献的著名学者——，文化思想界、学术界都作过什么样的历史评价呢？经过几十年历史文化的积淀，尤其十年“文化大革命”毁灭文化、否定传统的惨痛教训，我们能不能在以往褒贬毁誉的历史评价中进行再评价，得出一个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认识呢？

“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①郭沫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当然不是他自己标榜或创造社同人吹捧起来的。郭沫若给我们留下的等身著作，是一份珍贵而又丰富的文化遗产；尽管我们可以从他的浩瀚著述中找出某些失误或疏漏，但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的文化巨人的崇高形象，抹煞不了他的作品总体价值——无论是它的社会功利价值还是它的美

① 恩格斯：《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4页。

学价值。

学术界的研究者们几乎都承认，郭沫若研究迄今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领域。比之鲁迅研究，就其系统性、科学性、深邃性而言，郭沫若研究工作，包括资料建设工作，起步要晚得多；至七十年代后期，即郭沫若逝世以后，才有迎头赶上的趋势，并于近十年内取得了可观的成绩。目前郭沫若研究正呈现着方兴未艾的、生气勃勃的景象，可望在不远的将来会有一个新的飞跃，新的突破！

当然，这并不是说，自“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及其著作一向无人研究。对于一个在文坛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作过开创性贡献的作家，倘若一向无人去关心与评论，那将是不可思议的。其实，对郭沫若以及以他为代表的创造社的批评，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显得热烈而活跃，他和他的伙伴们并没有被遗忘、被冷漠。早在一九二〇年初，即郭沫若新诗创作处在高度兴奋的爆发期，负责编辑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宗白华，就连续写了许多批评的文字。当时宗白华就预言郭沫若是“一个东方未来的诗人”。作为一个编辑，他爱读郭沫若的新诗，“你诗中的境界是我心中的境界。我每读了一首，就得了一回安慰。因我心中常常也有这种同等的意境”。他希望《学灯》每期都发表郭沫若的一首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的清芬。你是一个Pantheist（英语，泛神论者——引者），我很赞成。因我主张诗人的宇宙观有Pantheismus（德语，泛神论——引者）的必要”。宗白华高度评价了郭沫若新诗的价值，同时又直率地提出了批评与建议：

……不过我觉得你的诗，意境都无可议，就是形式方面还要注意。你诗形的美同康白情的正相反，他有些诗，形式构造方面嫌过复杂，使人读了有点麻烦，……你的诗又嫌简单固定了点，还欠点流动曲折，所以我盼望你考察一下，研究一下，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象凤歌（即《凤凰涅槃》——引者）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但你小诗的意境也都不坏，只是构造方面还要曲折优美一点，同做词中小令一样。要意简而曲，词少而工。

……你有Lyrical（抒情——引者）的天才，我很愿你一方面多与自然和哲理接近，养成完满高尚的“诗人人格”，一方面多研究古昔天才诗中的自然音节，自然形式，以完满“诗的构造”，则中国新文化中有了真诗人了。^①

这恐怕是郭沫若及其诗作的最早的批评文字。作为文艺副刊编辑，宗白华凭着自己的学识和眼力，第一个发现郭沫若，肯定郭沫若，比较准确地分析了郭沫若新诗的风格特点及其在形式方面存在的缺点。这在诗集《女神》出版以前就能对郭沫若的创作个性与艺术风格提出如此剖切的认识与批评，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大体说来，郭沫若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第二阶段：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八年；第三阶段：一九七八年迄今。如此划分，主要着眼于各个阶段在郭沫若研究课题上所反映的特点，及其在学术理论方面已

① 田汉、宗白华、郭沫若通信合集《三叶集》第1—27页，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5月版。

经达到的水平。当然这只是粗略的勾勒，倘要细致地划分，新中国成立以前还可以再划为若干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郭沫若从诗人到战士，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经历了深刻的转变过程；这三十年，郭沫若坚贞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冲破层层浓云密雾，走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去迎接光明的新中国的到来。在文学事业上，这三十年也是郭沫若创作最丰盛的时期，从《女神》起步到抗战期间《屈原》等六部历史剧，郭沫若在新诗与历史剧领域出现了两个创作高峰；此外，他还写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和自传等作品，并有《浮士德》等许多译著。

文学创作贵在独创。郭沫若于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一日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抱和儿浴博多湾》、《鹭鸶》两首新诗以后，他的新诗之所以能引起评论界的密切关注与强烈反响，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富有独创性的诗人，他给新诗开拓了宽广的道路。所谓独创性，就是在作品中以鲜明的色彩所标示的“作者的纹章印记”^①。独创性是文学家、艺术家想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学家、艺术家能获得荣誉之所在。“五四”时期的评论文字，多数是围绕探讨郭沫若诗歌的独创精神而发表肯定的或批评的意见的。如谢康最早指出郭沫若新诗所具有的那种“奔放的热情，打破因袭的力”的个性特点；指出郭沫若“是自然颂歌者，是受过科学洗礼的，不流于虚灵飘渺，浪漫的幻想，与其他之颂歌自然不同”；他还认为郭

① 《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19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

沫若赞美物质文明与自然科学的进步，反映了本世纪近代人的思想，“我们不可不有这时代精神的讴歌者”^①。郁达夫明确地指出，在“五四”诗坛上，“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郭沫若“在新诗方面所成的事业”，是“不能完全抹杀”的^②。稍后的沈从文更是明确地把郭沫若推崇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可以称得起杰出的诗人，人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加以尊敬与同情”^③。

体现“五四”时期郭沫若研究最高水平的，首推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与〈女神〉之地方色彩》两篇论文。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提起他在国内时“每每称道郭君为现代第一诗人”；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说，“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④。闻一多把《女神》放在新诗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加以考察，认为《新青年》、《新潮》里的诗，属新诗的草创期；《女神》的出现，标志着新诗进入进化期。“《女神》当然在一般人的眼光里要算新诗进化期中已臻成熟的作品了”。在论文里，闻一多第一个科学地论述了《女神》所体现的时代精神：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① 《读了〈女神〉以后》，《创造季刊》1922年5月第1卷第2期。

② 《〈女神〉之生日》，1922年8月2日《时事新报·学灯》。

③ 《论郭沫若》，见李霖编《郭沫若评传》，上海现代书局1932年版。

④ 闻一多致顾一樵信（1922年6月）。

闻一多具体地论证了郭沫若从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在于他的诗作所映射的二十世纪的动的精神，“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其次是他的诗作所显现的二十世纪的反抗精神，“‘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闻一多给我们生动而具体地指出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五四以后初步觉醒的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象火一样燃着，潮一样涌着”，“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这时候，在世界呈现出死的岑寂的时刻，“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①。这段论述，深刻地阐明了郭沫若及其《女神》获得广大青年推崇与喜爱的社会原因。

在另一篇论文里，闻一多批评了郭沫若的《女神》，“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的了”。他主张新诗要成为“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但“五四”时期的新诗，包括郭沫若的《女神》，受着新思潮的鼓动，却“一变而矫枉过正”——“一味地时髦是鹜”，而把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忘却了，疏忽了。闻一多在分析《女神》欧化倾向的原因时，一方面指出诗人远离祖国，旅居“日本底环境应对《女神》的内容负一分责任”，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认为这是由于“《女神》之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批评诗人“不是对于我国文化真能了解，深表同情者”，则不符合郭沫若的实际，闻一多在论文里就“世界文学”问题发表了精辟的意见，认为优秀的文

① 《〈女神〉之时代精神》，《创造周报》1923年6月3日第4号。

学作品都应具有鲜明的民族的、地方的特色，“将世界各民族底文学都归成一样的，恐怕文学要失去好多的美。一样颜色画不成一幅完全的画，因为色彩是绘画底一样要素。将各种文学并成一种，便等于将各种颜色合成一种黑色，画出一张sketch（素描——引者）来。我不知道一幅彩色画同一幅单色的sketch比，那样美观些。西谚曰，‘变化是生活底香料。’真要建设一个好的世界文学，只有各国文学充分发展其地方色彩，同时又贯以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然后并而观之，各种色料虽互相差异，却又互相调和。这便正符那条艺术底金科玉臬‘变异中之一律’了”^①。这可以说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与特性的真知灼见。因此，闻一多要求郭沫若的新诗于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注意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摄取我国古典诗歌的长处，应该认为是合理的，它对郭沫若后来的新诗创作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注意了从分析我国旧诗的传统去发现郭沫若新诗的特点与长处。他认为，在“五四”诗坛上，新诗几乎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象，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从内容到形式对诗歌进行彻底改造并取得显著成绩的要数郭沫若。“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

① 《〈女神〉之地方色彩》，《创造周报》1923年6月10日第5号。

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如果说，闻一多着眼于文艺的社会功利价值去阐明《女神》的时代精神；那么，朱自清则把兴趣放在对诗歌艺术规律的研讨上，于比较研究中准确地捕捉了郭沫若新诗所具有的两个新的成份、新的特点。虽然朱自清未能详尽地展开论述，但要言不烦，他的意见一直影响着后来研究者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

《女神》以后，郭沫若陆续出版了《星空》、《前茅》、《恢复》等诗集。钱杏邨曾经把这些诗集作了比较，认为《女神》的“历史地位是很稳固的，它是永久性的创作”，《星空》可以附在《女神》里，即对社会的诅咒和愤慨，模糊的反抗精神和对原人生活的渴求等大致相近。“《前茅》里却不然，他发现了他自己应该走的路，他发现了人类的真正的敌对的方向，他继续的去效力的追求者，他是显明的向资产阶级进攻！然而，我们觉得究竟前者是可以代表时代的，比《前茅》伟大而重要，在技巧方面，《前茅》以及另一诗集《瓶》，实际上我们觉得是没有一首能赶得上《女神》的，大部分都是做的，做成的，而不是书写出来的”^①。有的评论文章及时地指出了郭沫若《女神》以后的诗的一些特有的倾向，即“《女神》以后的作者，接触实际社会的机会日多。社会上罪恶的症结在那里，人们互相恶战苦斗的实况是如何，作者已真彻知，加之自身所受物质上，精神上的痛苦，于是以前的狂热，变了现在的沉痛，从前的叫号，变了现在的坚毅，从前空漠的悲愤，变了现在实际的解决”；它所蕴含的悲哀，“更沉痛而着实”。“原来《女神》中的诗，只告诉我们破坏，《女神》以后的诗，则进

^① 《诗人郭沫若》，见李霖编《郭沫若评传》。

而告诉我们破坏的目标，怎样的破坏；《女神》中的诗，只告诉我们创造，《女神》以后的诗，则进而告诉我们创造的目标，怎样的创造”。《女神》时代的作者，唱‘凤凰涅槃’，唱‘天狗’，唱‘女神之再生’，乃至‘光海’、‘梅花树下醉歌’等等，多半是本着自己的悲哀，郁闷，激怒……唱着自我之毁灭，自我之再生。《女神》以后，作者便渐次将这悲哀，郁闷，激怒……推阐开去，于是对资本主义，不合理的旧道德，否定人生的宗教，奴隶根性的文学，……一齐下猛烈的攻击，于是显明的表同情于劳工，乞丐，失业的人们”，这就是“真正的极致的自我精神之扩张”^①。这篇写于一九二四年二月的文章，比较明晰地概括了《女神》以后郭沫若思想的发展，但对这些诗集在艺术风格上的变化缺乏分析。

冯文炳（废名）写于三十年代的一篇文章，则是侧重于分析郭沫若新诗的艺术风格。他指出，郭沫若新诗的许多篇什，证明了在“五四”新诗坛上“无疑义的可以站得住脚了”，已经足以与旧诗抗衡而“不怕旧诗在前面威胁”。他把郭沫若与冰心的诗“相提并论”，以为“都表现了第二期新诗的特点，他们做诗已经离开了新旧诗斗争的阶级，他们自己的诗空气吹动起来了，他们简直有一个诗情的泛滥”。冯文炳分析了郭沫若新诗之所以具有浓重的“楚国骚豪的气氛”，“大概因为诗体解放而有诗情解放，因为诗情解放而古代诗人的诗之生命乃在今代诗人的体制里复活”。对于郭沫若所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冯文炳认为这是浪漫派诗人的特色，“因为新诗而脱去了‘做’诗的束缚，这一派的诗人乃自由滋

^① 洪为法：《评沫若〈女神〉以后的诗》，见黄人影编《郭沫若论》，上海大光书局1936年版。

长，结果是上下古今乱写，没有一毫阻碍”；“他的诗本来是乱写，乱写才是他的诗，能够乱写是很不易得的事”。所谓“乱写”，即诗人任凭感情的自然流泻；但它有时难于用言语表达而破坏了诗美。冯文炳还比较了郭沫若诗与康白情诗的异同——“两位诗人的天才都是音乐的。不过康白情的诗是描写的，诗人的感情与外界景物和在一起的；郭沫若的诗是直抒的，诗人的感情碰在所接触的东西上面。因为是诗人的感情碰在所接触的东西上面，所接触的如果与诗感最相适合，那便是天成，成功一首好诗”。他觉得，郭沫若的《夕暮》、《灯台》等诗，具有“普遍性与个性”的统一，“不但显出自由诗的价值，也最显出自由歌唱的诗人的个性，也最明显的表现着自由诗的音乐，可谓相得益彰”。

冯文炳对郭沫若主张写诗而反对“做”诗持有异议。他说：“古典派虽然在那里‘做’诗，却是很难了解诗的普遍性这个道理。郭沫若的诗是写出来的，写出来好就好，不好也就没法子好，有时想做也做不出来的。”他举《天上的市街》一诗的某些诗句为例，以为就“远不如古典派‘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做得好玩”^①。这就是说，“写”诗以直抒胸臆固然好，但也不可否认“做”诗往往使诗的意境、结构、语言更趋于优美与完整。

对爱情组诗《瓶》，郁达夫指出，一九二四年以后，郭沫若思想发生“剧变”，但“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

① 冯文炳：《谈新诗》，第147—1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的囚狱。……我说沫若，你可以不必自羞你思想的矛盾，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况且这过去的恋情的痕迹，把它们再现出来，也未始不可以做一个纪念”^①。蒲风把《前茅》与《瓶》作了比较，指出：“为什么同一时期的东西，《前茅》里的是那么热烈地喊着革命，而《瓶》里的只是‘儿女情长’的情诗呢？——解答这个答案并不困难，只要我们了解了迄今的中国文人尤其是诗人的生活并无保障，时有断炊之危，我们便晓得郭沫若对于现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会有新的觉醒，决不是偶然。但自他所翻译的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出版（一九二四年）以后，虽然在意识上他自己也自以为是新的，革命的了，而在实际生活的工作上，他却还是不够。苦闷中，自然也就无怪其会有小市民式的对于恋爱的真实的热情的流露了”。蒲风注意到了《瓶》在青年读者中的广泛影响，“事实上现今的青年如果稍能背诵几首新诗的话，那几首，不会是《女神》，《星空》上的东西，是《瓶》。《瓶》抓住了小市民的恋爱心理，《瓶》把恋爱情景作了活描”。郁达夫、蒲风等都肯定了《瓶》的美学价值，并且试图说明在郭沫若思想转变过程中《瓶》的特异存在的原因。蒲风对《前茅》、《恢复》还提出了批评意见，认为诗人“没有真正产生表现工人农民生活的诗”，诗人笔下的工农群众悲苦命运及其斗争生活，

① 《〈瓶〉附记》，《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第304页。